

杨坚白选集



山西经济出版社

杨坚白选集



山西经济出版社

〔晋〕新登字 4 号

杨坚白选集

*

山西经济出版社 (太原并州北路 11 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875 字数: 520 千字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

ISBN 7—80577—502—8

F·502 定价: 17.50 元



作者近照

八十抒怀

一

风雨同舟念吾曹，
神州解放日乾高。
老夫笔虽今犹健
九死一生非自豪。

二

看破红尘色即空，
荣华利禄水流东。
苦心孤诣求真谛，
任尔东西南北风。

小 传

杨坚白，辽宁本溪人，1911年4月生。

曾用笔名：杨娱天、于天、杨异同、非石、康莫逆。

现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合作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委员。

一

我出生在一个破落地主的家庭，十岁后就屋无一椽，地无一垄了。是靠父兄薪资勉强维持生活。迫于家境，我的求学总是时读时辍，什么学校也未毕业。后来，进入高等师范学校，但不到两年就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九·一八”炮火轰出了校门。

所幸我的父亲在清末毕业于本县的师范学堂，终身教书，因而我得以在家中从父读书，读古文古诗，读孔孟之书，也学数学。同时，东北这块半殖民地，有学日本语的条件。为了求知，我还下功夫学日语、日文。

二

“九·一八”事变，日寇入侵，山河破碎，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我痛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乃下决心为抗日救亡而献身。嗣经友人张晓岩的介绍，结识了李烈生同志（即李兆麟），进而由李介绍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从此，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活。

可是，曾几何时，组织破坏了。那个无耻的叛徒并不知我的住所，他向敌人献计，带着他们查户口，终于把我查出来，于是我被奉天日警逮捕。从1936年开始，在牢狱中渡过了五个春秋。日本帝国主义把共产党视为秘密结社，文字宣传，没有杀我们的头。（在此前后被捕的共产党人一个也未杀）

奉天监狱是历次被捕共产党人活动的场所。我们当时是在杨一辰同志领导下活动。孙已太和我担当同狱外党组织的通信联系。监狱医务所是我们的“联络点”。大夫、看守几乎全是我们的好朋友、同情者（日本人例外）。通信、传递文件、生活关照等都靠他们帮忙。狱中曾经发展过党员，我也曾发展温建平同志为党员（现已离休，语言学院前院长）。狱中有几本代代相传的马克思主义的书，我们还买到过日本改造社出版的某些马克思主义的

书物,记得曾有瓦尔加主编的日文版《世界经济和经济政策》等。这就是我们在黑暗中仅有的精神食粮。

三

当我在1938年6月出狱时已是抗战第二年了。在东北,接不上组织关系;到北平也找不到关系。于是决定由海路经香港、广州去武汉。詎料战情急剧恶化,及至我航抵香港时,武汉撤退了,广州也失守了。不得已经由澳门、中山,朝西北方向的梧州、柳州进发。行抵肇庆,旅囊告罄,乃到难民收容所报到,取得难民资格,领了难民证。从此,即以难民身份流浪到梧州、柳州;再沿西南公路,靠行乞、徒步跋涉,流浪到重庆。到达重庆时已经是1938年的最后一天了。

在重庆,经过几天的奔波,终于找到了东北救亡总会,并被接受到会内工作,担任《反攻》编辑,后又担任服务队(即宣传队)长。接着,党的组织关系也解决了。我当时写过几篇文章(笔名非石),但组织上给我的主要任务是团结教育青年,准备北上抗日。在我们这个环境中,可以公开阅读马列主义的书,讨论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并以讲座形式培训青年。事后有人回忆说,在这里工作、生

活，等于上了一次党校。

为了达到北上抗日的目的（所谓北上抗日，说穿了，就是为党向北方输送干部），组织决定由我率领东总的一批青年，包重庆总会和成都分会的青年，参加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分会宣传队，成为该队的组成部分。分会的负责人王葆真是国民党进步人士，队长陈甫子是共产党员，我任副队长。我与陈不发生党的联系，彼此均以进步人士面目出现。这在统战环境中是常有的。

1940年初，我们从重庆出发北上，经西安到洛阳。当时由于国共磨擦加剧，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被赶出北方战地。我们这个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下面的军事机构，也就停滞在洛阳不得前进了。

由于王葆真同八路军有往来，蒋介石对他不放心，于1940年夏，下令调王葆真回重庆工作，接着，我们的宣传队也就随之而解散了。

当此之时，适值孟用潜来洛阳，组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晋豫办事处。组织决定，我们这批来自东总的青年去参加孟用潜主持下的工业合作工作。这也是我走上经济战线的开端。

在工合工作几个月之后，当时因有一笔工合国际赠款拨给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区（太行区抗日根据地），孟用潜决定派我到这个地区去创办工业合

作。经与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洽商,先到黄河北岸的八路军兵站,再随军上山。于是在1940年末,我和我的伴侣丁平同志一起,离洛阳,渡黄河来到驻在济源的八路军兵站。接着,于1941年初登上了太行山。我们的公开身份是工合工作者,实际上是共产党员回到了党的怀抱,回到了自己的家——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四

不过,我到根据地后,工作任务发生了变化,不是办工合,而是作公营工业管理工作。担任过科长、厂长等职,后来还主编过《太行工业》刊物。

这一历史阶段,值得记述的是我参加了整风运动,从1943年冬开始。

在整风运动中,我被定为审查重点。提出的主要矛盾是:日本法西斯那么残暴,为什么不杀你?为什么把你放出来?你为什么来到北平?又为什么从华北敌占区绕道华南来到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为什么又离开重庆来到太行区?……整风领导者理直气壮地提出这些问题来,他们主观认定,这不是有目的地钻进来的坏人又是什么?这真是“秀才遇见兵”,不论我如何解说,都是无济于事。大整风班结束后,我们少数几个重点分子被留

下来送到一个新居——清漳河畔的公安局外院。我们仍然保持整风班条件下的行动自由。实际上是背靠背地审查,不批也不整。我们可以游山,可以玩水。我则千方百计地搜寻、借阅当时的一些理论书籍、文艺书籍。以读书为乐。

天不绝人!我终于设法查访到杨一辰同志的下落。他没有死,出了狱。当我查访到他时,他是我党山东分局的城市工作部长。经过他的证明,才把我从倒悬中解救出来。我真该“感谢”当时的“左”倾领导人,他们没有把我处决。据悉,是由于没有任何证据,才把我放在那里“冷处理”。

待到解除倒悬,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时,已是解放战争开始后的1946年了。经过这番曲折,痛感无知、愚昧、主观主义、害人之甚。我下决心要学习理论,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作无头脑的应声虫。正是经过整风,使我确立了作人的科学态度。

抗战胜利后,从敌伪方面接收了一些工厂、矿山。都需要有会计、统计知识。我一方面总结,研究工业管理经验;一方面编写讲义,提供培训干部之用。后来,形成了《实用工业会计和成本计算》、《实用统计方法》两本书,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这可以算作我的处女作。《实用统计方法》

后来又由东北新华书店两次再版。当时，解放区还没有“土著”的统计学书。

五

1948年，我回到东北。先后在辽北、辽西省政府任研究室主任。直至1950年11月。当时侧重于农村政策的研究。除草拟调查报告、研究报告之外，也结合研究的问题，偶尔写点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1950年11月至1954年秋，在东北统计局工作，先后任秘书长、副局长等职。过去我们读过的统计学都是资产阶级学者写作的。解放后，输入了苏联的社会经济统计学，使我们的耳目为之一新。为了求知，也是为了业务上的需要，我曾经努力学习，并组织编译了一些东西。我写过一些关于统计的文章，后来写作出版了《统计理论基本问题》的书，还翻译了《统计和计划》（斯梅霍夫著）、《怎样研究经济现象的动态》（基里迪舍夫著）等书。

当时，除行政事务工作外，我的主要任务是主持东北地区的国民收入计算和国民经济平衡统计。此项工作是在1951年，由顾卓新同志（当时的东北计划委员会主任）倡议开始的。计算方案由苏联统计专家帮助设计，再结合我国实际修改、制定。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民收入计算的开端。1954年秋,我调到国家统计局后,仍是在此基础上,主管全国的国民收入计算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工作。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个人的爱好,这个领域竟而成为我后半生的研究专业。

1956年,由于某些复杂因素,我离开国家统计局调到国家计委世界经济研究局工作。为了提供编制计划的参考,主持写作了《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条件、方法和特点》一书。因当时发生了波匈事件,我个人主要是研究了波兰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

六

1958年10月,应孙冶方之约来到经济研究所作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以至于今。

我所研究的是以社会再生产理论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问题为中心的课题。所有研究项目均是环绕这个中心展开的。只是我还不忘我的老行道,所以还挤出一部分时间研究统计理论问题。这些年的研究写作成果,均已先后以文章、书籍形式发表,无需具体罗列出来,只讲讲个别事例。

关于生产价格问题。六十年代,我的生产价格文章(已收入本文集)发表后受到了大批判。此

事颇饶兴趣，试略言之。

1964年的批孙（冶方）战役，第一炮是瞄准我打响的。记得是在6月下旬的一次座谈会上，针对我的生产价格文章，以倾盆大雨般的炮火来了个突然袭击。座谈行将结束时，孙冶方声言：“生产价格的祸首是我孙冶方，下次会我发言，请大家批我。”冶方固然有为我开脱之意，不过他心里明白，明白人也都看得出，假如仅仅为了批判杨坚白，何必这样大动干戈。这本来就是“引蛇出洞”之计，果然，孙冶方“赤膊上阵”了。座谈的重点当然转为以批孙为重点，然而批孙也不忘批杨。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正在展开四清运动。在作为序幕的座谈会之后，接着就由某公率领百余人的四清工作组进驻仅有二百名干部的经济研究所。四清的过程就是揭发、批判、斗争的过程。不必赘言。遗憾的是我未经得住考验，由于精神过度紧张，到11月中旬就被整得胃穿孔而住院了。经过胃切除的抢救手术，我又活过来了。接着到香山疗养，住在红叶村。感而赋五律一首。诗曰：

瀚肠伐胃后，死去活来时。

频发条条丑，文章处处疵；

寒梅应更瘦，塞雁亦何知。

风雪难明夜，吠声绕萝思。

经过这次大手术，根治了胃病，我不仅没有死，身体反而一年比一年好起来，真是大破大立，“整”得好！

又两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是个早已公之于众的重点批斗对象，当然是在劫难逃。批斗、培斗、不断训斥，这些自不待言。好在我没有挨打、挨骂，搞“喷气式”的次数也不多。在当时这可以算是“文明”批斗了。至于个人的精神状态，由于我是个“老运动员”，多次坎坷，久经风霜，较早地意识到这样翻天覆地的大运动，瞎折腾，显然是领导上犯了错误，众百姓是无可奈何的。因此，我倒是坦然处之，随遇而安，“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我没有气馁，而是愈战愈强了。打倒“四人帮”后，逐步恢复了研究工作。失去的时间不可能追回来。惟有自强不息，孜孜不倦地努力以赴。这些年，我把六十年代即已着手研究、写作的《论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两书写完出版；又主编了《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的若干理论问题》专著；出版了《统计理论研究》文集；近几年，我同李学曾、杨圣明合写的《当代中国经济》，同莫曰达、冯杞靖、邵祥能合写的《统计学原理》

均已出版。我主编的《合作经济学概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也已出版。明年拟转入《人口经济学》的研究，从宏观经济角度考察人口问题同时，我还在指导几名博士研究生，深望后起者青胜于兰，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和国民收入的理论和实践上作出贡献。

我行年七旬又七，即将离休。然而对共产党员来说，皓首丹心，仍将离而不休，继续战斗下去。有生之日，皆笔耕之年！

杨坚白

1987年国庆节写于北京永安南里

目 录

第 一 部 分

略论价值的实体·····	(3)
关于价值和价值规律的考据·····	(13)
关于价值规律与首要经济规律的比较分析·····	(47)
自觉地运用以价值规律为中心的经济规律体系·····	(58)
价值规律和计划管理·····	(62)

第 二 部 分

国民经济平衡和生产价格问题·····	(75)
再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问题·····	(106)
三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问题·····	(126)
四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问题·····	(134)
关于所谓“转形问题”论争的简单考察·····	(148)

第 三 部 分

论社会主义的市场实现问题·····	(165)
论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	(182)
论计划经济与商品货币关系·····	(192)
从孙冶方的流通理论谈起·····	(210)